



阅读日本
书 系

世博会与战后日本

万博と戦後日本

吉见俊哉\著 李斌\译



EXPO '70

1970日本大阪世博会



EXPO '75

1975日本冲绳世博会



EXPO '85

1985日本筑波世博会



1990日本大阪世博会



EXPO
2005 AICHI
JAPAN

2005日本爱知县世博会

每川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南京大学出版社



阅读日本
书 系

世博会与战后日本

万博と戦後日本

吉见俊哉\著 李斌\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博会与战后日本 / (日)吉见俊哉著;李斌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2

(阅读日本书系)

ISBN 978-7-305-16501-6

I. ①世… II. ①吉…②李… III. ①城市发展-研究-日本 IV. ①F29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3951 号

《BANPAKU TO SENGO NIHON》

© Shunya Yoshimi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public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简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3-33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阅读日本书系
书 名 世博会与战后日本
著 者 吉见俊哉
译 者 李 斌
责任编辑 田 雁 编辑热线 025-8359602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20 印张 11.5 字数 201 千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501-6
定 价 45.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另一个 1970 年——辐射雨和美国伞

“富裕的战后”的终结

由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的地震及核电站事故的扩大化,我们的“富裕的战后”终于宣告终结了。其征兆从 1990 年代起就已经很明显了。泡沫经济的崩溃和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的结束,还有 1995 年相继发生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事件,都让我们体会到了“富裕的战后”的终结。

那时的地震也是突然发生的。十六年前的 1 月 17 日,以淡路岛北部为震源的大地震给大阪和神户地区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地震的整体震级为 6 级,在大阪和神户之间的区域则达到了 7 级。死亡和失踪人数为 6434 人,受伤人数为 43792 人,避难人数则超过了 30 万,全部或一半坍塌的住宅约为 25 万户,被认为是关东大地震^①以来最大的地震灾害。水电煤气等公共服务的输送中断,陷于瘫痪。阪神高速公路有十几处被破坏,山阳新干线也多处断裂,地铁的隧道也塌方了。市中心很多楼房倒塌,崩塌的高速公路和燃烧的街道的影像连日在电视上播放,使人们陷入一片茫然。

在整个日本还没有走出大地震阴影的 3 月 20 日,在东京市中心又发生了更深刻地震撼列岛居民的事件,也就是奥姆真理教信徒犯下的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他们在东京市中心的多辆地铁车厢内投放沙林,这是一种曾被作为化学武器使用的神经性毒气,结果

^① 1923 年 9 月 1 日发生在日本关东地区的 7.9 级大地震,造成了约 14 万人死亡或失踪。另外,全书的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导致 12 名乘客和车站工作人员死亡,5510 人负重伤或轻伤。事件发生两天后,警视厅对山梨县上九一色村(现属于甲府市)的教团本部设施进行了强行搜查,结果发现了沙林等化学武器的制造设备。据被逮捕的教团干部招供,从 1994 年的松本沙林事件^①到地铁沙林事件,都是奥姆教出于信仰而进行的犯罪。从这次强行搜查到 5 月 16 日教祖麻原彰晃(本名松本智津夫)被逮捕的约两个月时间,因为对这个特异的宗教团体难以理解,整个日本社会都处于一种异样的兴趣中。

对“富裕的战后”破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1995 年和 2011 年的两次地震,都伴随着与今天的科学技术有关的“人祸”,一次是用化学武器进行的恐怖袭击,一次是核反应堆熔毁带来的核污染,这具有象征意义。实际上,在 3 月 11 日以后,因为核电站事故的解决遥遥无期而多次在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露面的东京电力和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干部们面无表情和缺乏现实感,让人想起了十六年前因为恐怖袭击而登上电视的教团干部。最重要的是,我们曾经在媒体上看到的奥姆真理教总部的真理之家(Satyam)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堆建筑在外观上何其相似。要说区别的话,那就是几座核反应堆已经被爆炸破坏得旧貌无存了。至少在很多人看来,两起事件具有相似之处。这种印象与人们对如今的科学技术和专家的不信任感也有关系。

面对由于可怕的大海啸而瞬间化为一片废墟的东北沿岸的景象,我们束手无策,唯有阵阵揪心。面对来不及逃走就被浊流卷走的两万几千个生命,面对无数亡魂,我们这些幸存者到底能做些什么呢?这种心情正在弥漫整个列岛,今后大概也会长期存在于社会中吧。对于这次地震,必须要进行安魂。对于那些逝去的魂灵和东北地区的重建,也必须采取真诚努力的措施。不过即便如此,大海啸和核电站事故也并非一回事。后者是“人祸”,是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到现在的归结性事件。对于该事件,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彻底追查其原因,而不是安魂。但是,如果向上追溯这次事件的原

^① 1994 年 6 月 27 日发生在日本长野县松本市的恐怖事件,凶手在住宅区散布沙林毒气,造成了 8 人死亡,600 多人受伤。

因,就会触及战后日本这一根本性的存在。而且,事态向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决定性时期与本书将要考察的战后世博会的时代也是重合的。

美国的两把“核保护伞”

福岛核电站诞生的原点可以追溯到1960年,也就是日美安保斗争^①的那一年。该年,福岛县表示要引进核电站,次年,也就是1961年,准备要建设第一核电站的大熊町和双叶町的町议会通过了引进核电站的决议。当时,福岛县在能源产业的引进上进展缓慢,这对其经济高速发展不利,而且,由于能源政策由煤炭向石油转变,导致县内最大的能源产业——常磐煤矿也日趋衰落,因此他们正在寻求代替水力和火力的第三种电力来源。正好大熊町在沿海的断崖边有一块地是原日军航空队基地,战后一直作为盐田使用。由于其占地面积广,收购也容易,所以被认为是建设核电站的绝佳场所。土地收购在东京奥运会举行的1964年完成,1967年一号反应堆开始动工,并于大阪世博会举行的1970年完工,1971年开始投入商业运营。也就是说,福岛第一核电站从决定引进到开工,再到开始运营,正好和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重合在一起。

值得关注的是,不仅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战后日本所建设的众多核电站运营开始的时间大都集中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稍早于福岛第一核电站建成的敦贺核电站一号反应堆和美滨核电站一号反应堆投入商业运营都是在1970年。这两个核电站都位于福井县,另外,福井县的高滨核电站第一反应堆也于1974年开始商业运营,九州的玄海核电站一号反应堆于1975年,静冈县的滨冈核电站一号反应堆于1976年分别开始商业运营。考虑到从规划、引进、建设到开始运营需要将近十年的时间,因此日本各地的核电站几乎都是在1960年代进行规划和引进,70年代开始运营的。当然,大部分核电站继一号反应堆之后又新建了二号、三号反

① 从1959年到1960年,为了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而进行的全国性斗争。

应堆,所以反应堆的增设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中期。在197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开始运营时日本只有4座核电站,结果到了90年代中期增长至54座,数量仅次于美国和法国,位列世界第三。

为什么日本各地会在1960年代同时规划和引进如此众多的核电站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追溯到1953年至1954年发生的两件事情中寻找启发,从时间上看,是在这些核电站被引进前十年左右。这两件事都是冷战期的美国发展核战略时发生的。

其一是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权提出的“新面貌”(New Look)和“原子能为和平服务”(Atoms for Peace)这两大政策。他的前任杜鲁门政权虽然下令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不,可能正是因为下令投掷了原子弹,所以当他在发现这两个城市的无差别杀戮效果惊人之后,便开始将原子弹看成不同于常规武器的最终手段。与此相对,艾森豪威尔政权则将所有的核武器作为可以在实战中使用的兵器,部署到了全世界的美军基地中。他把在前任政权中原本属于原子能委员会的核武器管理权移交给了军方,并准备对共产党国家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各同盟国的前方基地配备大量的战略核武器。结果,北约各国的核武器大量增加,总共部署了多达七千件的核武器。在亚洲的韩国、菲律宾、台湾等地也都进行了部署,在冲绳,以嘉手纳基地为中心部署了将近八百件核武器。就这样,到艾森豪威尔离任时为止,美军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超过了两万件。

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政策就是将美国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都进行核武装的强硬战略。而与该政策相反相成的就是“原子能为和平服务”政策,即试图在全世界推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他于1953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承诺美国将协助各国进行有关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共同研究和核电站建设。强调核能的“和平利用”,向他国提供核能的好处,采取这种姿态有助于改善因为投掷原子弹和推进核武装而成为军事威胁的美国的形象,并让世界各国更容易接受核能。

1953年苏联进行的氢弹试验让美国认识到,要想在核武器上保持压倒性优势已经非常困难了。因此,美国试图通过向第三世界国家积极提供原子能技术,并与这些国家进行以和平利用为目

的共同开发等手段,将它们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另一方面,苏联为了对抗美国,也试图向周边各国提供原子能技术,因此,处于这两个大国势力范围中间地带的国家同时受到了这两国的“核推销”。像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这些不久之后将阻碍美国全球战略的国家,其最初引进原子能技术时,实际上是由美国推进的。

当初,原子能为和平服务政策的直接对象是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接壤的第三世界国家,而并非业已成为美国同盟国的日本、西德等原轴心国。但是,对于日本国内的保守势力来说,这项政策是很有魅力的,他们非常想参与其中的技术提供。尤其是50年代中期,热心扮演艾森豪威尔核战略的响应者角色的,是后来成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①以及首任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读卖新闻社的老板正力松太郎^②。

中曾根在今年的事故之后仍然主张“世界的总趋势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我没有否定能源利用”。而在1953年,“当我得知艾森豪威尔总统将转变政策,提倡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时,我想:‘日本也不能落后,今后将是原子能的时代’”(朝日新闻,2011年4月26日)。于是,在保守势力的帮助下,中曾根推动国会通过了原子能预算案,设立了超党派的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他还推进了原子能立法,这是后来的原子能政策的基础。中曾根与原子能的关系是如此之深,一位曾经受其影响的著名政治家说:“中曾根先生提出的‘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让人无法忘记。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长崎、广岛的原子弹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虽然我不懂他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总觉得这个人讲的东西真不得了”(《朝日新闻》,2011年5月30日)。

另一方面,与中曾根齐头并进,强力扮演媒体方面的推动人角色的则是正力,他充分利用旗下的《读卖新闻》和日本电视台,展开了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宣传攻势。正如有马哲夫在其著作《核电

① 中曾根康弘(1918~),政治家,1982年11月至1987年11月任日本首相。

② 正力松太郎(1885~1969),实业家、政治家,1924年出任《读卖新闻》的总经理,振兴了当时濒临破产的《读卖新闻》。他还是日本职业棒球之父、电视传播之父、核能发电之父。1956年出任首届科学技术厅长官。

站·正力·CIA^①》(新潮新书,2008年)中提到的那样,曾经热衷于在远东建设微波通讯网的正力与CIA等间谍机构以及通用电气公司(GE)、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等电机企业的关系很深,这些电机企业也是原子能产业的重要中坚力量。正力从美国邀请来了原子能和平利用的使节团,在《读卖新闻》上不断开展推进核电站的宣传攻势,还举办了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览会。他打着核电站的旗号成功进入政界,当上了原子能委员会的首任委员长,进而出任科学技术厅长官。

从艾森豪威尔政权的立场来说,“新面貌”也好,“原子能为和平服务”也罢,都是基于同样的经济原理。根据该政权的预测,冷战很可能会长期化,美国社会要想长期维持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紧张局面,需要冒一个险,即在控制军事费用、维持稳定财政的同时,谋求增强军备。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因为朝鲜战争而膨胀,要想继续增强常规武器和地面兵力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与常规兵力相比相对廉价且具有绝对攻击力的核武器是一种极具魅力的技术。这与核电站对电力公司来说具有魅力完全出于同样的理由,水力发电需要先行在大坝建设上投入巨资,而火力发电则会因为石油价格而时喜时忧,与这两者相比,原子能被认为是相对便宜的能源。

第五福龙丸和“原子能和平利用”

然而,“原子能为和平服务”政策不仅仅是开发能带来富裕生活的廉价新能源,还带有特别的政治意义。那就是忘却广岛和长崎。如果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在世界各地顺利开展的话,人们将不再会认为它是导致核战争的破坏性技术。尤其对于日本这个因为广岛和长崎的两次被炸而反感感情强烈的国家,如果能让其承认核能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的技术,就可以使美国带给其的“被炸”记忆背景化,让其承担“核保护伞”的部分任务就会变得更加容

^① 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美国政府的情报、间谍和反间谍机构。

易。作为正力松太郎的心腹，在将核电站引进日本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柴田秀利在 50 年代初期就曾说过：“日本自古以来就有‘以毒攻毒’的说法。原子能是把双刃剑。要打倒反对原子弹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大肆宣扬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给未来将要发生的伟大的产业革命以希望。”（佐野真一《巨怪传》，《文艺春秋》）通过强调建核电站是为了带来“和平、富裕”，可以让人们忘却对“原子弹”的记忆，借此，“核电站”逐渐成为了使日本加入美国的“核保护伞”的象征性媒介。

然而，正当正力、中曾根、CIA 等掀起这股潮流时，出现了一起突发事件，那就是第五福龙丸遭受大量核辐射。1954 年 3 月 1 日，美军在比基尼环礁试爆了一颗氢弹，据说其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一千倍，从而导致周围数百公里被大量的高能辐射所笼罩。这次“试验”使生活在马绍尔群岛的众多居民遭受辐射后死亡，后来也长期苦于后遗症。另外，在离美军指定的危险区域外侧很远的范围内也有数百艘渔船受到辐射，其中，距爆炸中心一百五十公里的第五福龙丸受到的辐射尤甚，船体蒙上了一层死灰，虽然赶紧回到了烧津港，但船员被诊断为辐射病，一人死亡，其他的船员也一直苦于后遗症。不久之后人们得知，不仅船员遭到了直接辐射，而且从日本各地捕捞上来的鱼也受到了辐射污染，另外，含有放射能的气团也随着气流从太平洋上蜂拥而至，降下了辐射雨，导致草莓、蔬菜、茶叶、牛奶等农产品中被测出有辐射，一时舆论哗然。

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了该次“试验”，不过美国方面申辩说日本患者的发病原因不是核辐射，而是“珊瑚礁物质的化学作用”。他们还指责第五福龙丸在美军指定的禁入区内进行捕鱼作业，不过该船确实是在指定区域外作业的，这已经得到了确认。更有甚者，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刘易斯·施特劳斯（Lewis Strauss）居然说马绍尔群岛居民是“健康而幸福的”，第五福龙丸有可能是“共产主义的间谍”，其船长“肯定受雇于俄国人”，并要求 CIA 进行调查。艾森豪威尔政权的高官向总统报告说：“日本对核武器过于敏感，近乎病态。而且日本人具有一种民族受害感，觉得他们是被选中的牺牲者。”在氢弹试验后八个月举行的日美联合会议上，美国政府还反复强调没有核辐射事故，并出示了一种“新标准”，将辐射的

世博会与战后日本

安全标准提高到原来的约一千倍。另一方面,美国的进口企业却在禁止日本的罐装金枪鱼发货到美国,并要求日本用 GM 计数管进行精密检测。

当然,随着第五福龙丸的被辐射和渔业遭受损失的真相大白,对氢弹试验的反抗扩大到了整个日本社会。东京都杉并区的主妇团体发起的禁止使用核武器运动急速扩大,不久就收集到了三千两百万人的签名,这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该运动的波及范围远远超过了原有势力的运动规模,在舆论调查中,反对核武器也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虽然日本政府支持“该试验是美国出于防卫上的必要而进行的”这一观点,不过这种官方见解只是徒招舆论的反感,反核情绪甚至蔓延到了保守势力中。

在比基尼环礁发生的事件不久之后催生出了一部纪念碑式的电影作品。不用说,那就是怪兽电影《哥斯拉》,哥斯拉的异形就是第五福龙丸所遭遇的“火球(=氢弹)”的隐喻。电影《哥斯拉》通过异形怪兽对东京的破坏(让人联想起东京大空袭)将美国进行的氢弹试验(=未来战争)和日本人的战争记忆联系起来,表现了日本人对核抱有的大众性恐惧(武田彻《“核”论》,中公文库)。

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览会与“铁臂阿童木”

一般认为,从日本社会的这种对核能的强烈恐惧感来看,要把日本纳入美国的“核保护伞”并非易事。不管美国国务院和日本政府说什么,仅凭冷战、反共等口号无法消除遭受了继广岛、长崎之后第三次核辐射的日本社会对核的恐惧。这时,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及其所能带来的“富裕生活”的意象被看成能扭转这种情况的有力手段。据彼得·库兹尼克(Peter Kuznick)说,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委员会提议,应该在日本建设试验用的核反应堆,并对其发起有关原子能非战争利用的强力攻势,而原子能委员会的托马斯·墨瑞(Thomas Murray)则主张,在经历过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的日本建设原子能设施,将会成为“将我们所有人从两座城市的大屠杀记忆中完全解放出来的戏剧性的、基督教式的行为”。《华盛顿邮报》称赞这一想法是“消除亚洲所持

有的‘美国将东洋人看成核弹的牺牲品’这一印象”的最佳方法（Peter Kuznick, Japan's Nuclear History in Perspectiv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13 April, 2011）。

也就是说，在认为核电站建设能够有效地将日本人从原子弹的记忆中“解放出来”这点上，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原子能委员会的战略构想与以正力为中心的日本保守势力的构想是完全一致的。就这样，在 50 年代中期，正力充分利用《读卖新闻》的版面开展起了“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宣传攻势。1955 年 5 月，他从美国邀请来了“原子能和平利用使节团”，而在此之前，他在日本组织了“原子能和平利用恳谈会”。当时负责与经济界人士进行交涉的《读卖新闻》职员后来回忆说，那时，就连日本经济界人士“也有很多人认为核弹很可怕，日本将会成为美国的原子弹工厂，说服他们费了很大劲”（佐野真一《巨怪传》，《文艺春秋》）。

如此一连串宣传攻势的压轴戏，是同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12 日将会场设在日比谷公园的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览会，它是在 CIA 的协助下举办的。会场中“摆放着原子能列车、原子能客机等模型，讴歌着原子能的‘光明前景’。最精彩的是前一年 3 月在比基尼环礁遭受了核辐射的第五福龙丸的展示”（佐野，同上）。第五福龙丸是禁止使用核武器运动的象征性事物，将它拉过来吸引大众的关注，若无其事地兜售产自美国的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意识形态，这正是宣传策划人正力松太郎的典型手法。

拙著《博览会的政治学》也曾论述过，1955 年是标榜战后复兴的中等规模的博览会盛行的时期。从 40 年代末起，各地就试图将博览会作为战后复兴的助推剂而不断举办复兴博览会、贸易博览会、产业博览会等。它们大多由报社单独或共同主办，因此以“原子能”为主题举办博览会对日本的报社来说是拿手好戏。比如 1950 年《朝日新闻》在西宫^①举办的美国博览会的入场人数超过了两百万人，规模宏大。为了向观众们展示美国的全貌，入口处附近建起了模仿帝国大厦的导游塔和林肯像，会场内则林立着美国全景立体画、西部全景立体画、白宫、农业馆、宗教馆等。原子能和平

① 位于日本兵库县东南部的一个市。

世博会与战后日本

利用博览会只不过是这种从“圣战”到“美国”无所不包的博览会的“原子能版”而已。

不过,这些博览会与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虽然同为博览会,但大不一样。这不仅是规模的问题,毋宁说是阶段论式的差异。也可以说是给人们提供“梦想”意象的博览会与让人们真实感受到“梦想”实现的博览会的区别。实际上,一直到60年代初为止,原子能对日本来说都只是梦想而非现实。正力和中曾根成为美国“核保护伞”的中间人的时候,原子能在他们嘴里就是将来应该实现的理想。

因此,在想象原子能利用的理想形式时,应该与实际发生过的核弹灾难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1950年代到60年代,体现了这种想象中的原子能利用的理想形式,让孩子们无比狂热的是体内具有核反应堆、以核聚变的能量为动力的电脑机器人“铁臂阿童木”。阿童木的妹妹叫“铀”,哥哥叫“钴”,其名字都是放射性同位素。至少读者和观众在铁臂阿童木“对人类的爱”中看到了作为“正义”的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可能性。

煤矿关闭和通用村的“美国”

开沼博在其向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学际情报学府提交的硕士论文《战后经济增长的能量——原子能村的历史社会学》(2011年1月)中,对东京电力福岛核电站周边地区进行了多次详细的实地调查,考察了福岛的地域社会自发地依赖上核电站设施的过程。过去,福岛核电站所在的双叶郡,即使在福岛县内也是最穷的地区。战后,由于濑户内海的制盐业衰退导致日本食盐不足,因此福岛县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制盐,并获得了若干现金收入。另一方面,到20世纪中叶为止,该地区最大的能源产业一直都是常磐煤矿。该煤矿从现在的福岛第二核电站所在地附近一直延伸到茨城县北部,面积广大,在其鼎盛时期是和九州筑丰、北海道的石狩齐名的大煤田。战争时期,它被卷入了煤炭增产的大潮中,而在战后复兴期,为了确保供不应求的电力供应,煤炭又被视为不可或缺的能源资源,增产压力一直存在。

然而,从1950年代中期起,这一态势骤变。在美国石油资本的斡旋下,来自中东的廉价高效的石油被大量进口到日本,从煤炭向石油转变的“能源革命”急速爆发。不久,煤炭需求一路下滑,一直由常磐煤矿支撑的该地区的经济基础也就随之失去了。在县内最大的能源产业,也就是常磐煤矿衰退的过程中,福岛县迫切需要寻找到新的强有力的能源产业。

这时,该县所选择的一条道路是通过大坝(位于奥只見)与核电站这两种手段,成为向东京及其周边地区提供电力的基地。迫使常磐煤矿关闭的能源资源的转换原本是与美国的石油资本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尽管如此,陷入困境的福岛不得不选择的却是开发TVA(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式的巨型大坝,是在“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口号下建设核电站设施,甚至是以“夏威夷”为模板开发度假中心,这些全都是将“美国”更深深地嵌入自己地盘内部的方法,真具有讽刺意味。

开沼的论文介绍了他的采访内容,很有意思,那就是双叶郡在采用通用公司提供的技术建设福岛第一核电站时,该地区是如何接纳通用的技术人员的。根据该论文,当核电站建设开始后,发电站用地内建起了“通用村”,新盖了很多独门独院的房子,通用公司职员及其家属住了进去。“村子”里还设有学校、教堂、网球场等,美国技术人员的家属会利用这些设施,或者在这里过周末。另外,据曾在通用村工作过的日本职员说,在村内,“美国式的派对频繁举行,借此与受邀参加派对的东京电力职员和当地居民加深友好关系”。该职员还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圣诞节和万圣节的家庭派对,当时我本来不吃肉,但受了通用村举办的派对的影响,开始吃肉了。”这简直就和占领期在美军基地附近建起的美军家属用的“集体住宅”一模一样。在煤矿走向关闭的过程中,没什么特别产业的东北偏僻地区建起的“核能的和平利用”设施与冲绳、横须贺有相通之处,是另一处日美同盟设施。

在辐射雨中撑起美国伞

这次,东京电力在大地震和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的应对很不高

明,日本政府也一片混乱,在这种背景下,美军和皇室所采取的敏捷的应对措施就显得格外突出。美军和天皇竟然成了应对危机的排头兵,历史仿佛一瞬间回到了60多年前的占领时期。奥巴马总统在地震发生后不久就说:“我们可以提供任何有必要的支援”,被命名为“朋友作战”的美军支援体制就立刻行动了起来。整个三月,美军共派出了19艘舰艇和18000名士兵进行地震救援活动,还集结了140架飞机。其规模之大与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不相上下。

地震发生后,美国政府立刻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应该是有其意图的。冲绳的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还处于胶着状态,更糟糕的是国务院前日本部长梅尔大放厥词说:“冲绳人是敲诈专家”,深深伤害了日本方面。因此,美国想通过大规模救灾支援活动改善上述状况,并引发“还是需要有美军驻留”的舆论。美国决不能放弃冲绳这处东亚军事霸权的要冲,它将大地震定位为“日本有事”,想要全面呼吁“日美同盟”的有用性。然而,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的危机管理体制脆弱得超乎想象,信息也很混乱,美国当时肯定很焦急,怕错过了难得的机会。对于日本究竟是否具有作为当事者的危机管理能力,美国政府应该是抱有不信任的想法的。

日本国民也欢迎与应对迟缓的政府形成鲜明对照的美军的迅速行动,以及与日本毫无用处的“技术力量”相比更具实质性内容的美国的军事技术。看了政府一连串的应对措施,如今很多日本人对以日本政府和东京大学为首的“权威”组织的专家们抱有很深的不信任感,他们觉得美国要可靠得多。

这是怎么回事呢?如前所述,为战后在日本各地建起福岛核电站等50多处核电站铺平道路的最大推动因素是“美国”。美国的占领并没有因为旧金山和约而结束,而是在整个战后历史中得到强化,不断地渗透到我们社会的深处。祝贺整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及其完结的1970年大阪世博会就是这种力量系统在战后日本(作为国民国家的日本)这一容器中到达临界点的瞬间。

因此,为了配合大阪世博会开幕,当源自正力松太郎构想的日本原子能发电为其供电而开始运行敦贺核电站一号反应堆,就不是偶然的了。顺便提一下,该一号反应堆的制造商也是通用公司,

因此在其建设过程中应该也同样出现了前面提到过的通用村。靠着通用的核反应堆输出的电力,庆典广场和展馆灯火通明,自动人行道和机器人各显身手,生动展示了“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世博会开幕约一年后,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反应堆也开始了运营,又过了两年,源自中东产油国的石油危机爆发,日本为了摆脱对不稳定的石油资源的依赖,越发加深了对核电站的依赖。

这种对核电站依赖的加深体现了日本人对核的否定态度的变化,它始于广岛、长崎和第五福龙丸这三次遭受核辐射经历的背景化这一狡猾的战略和安排,这一点我已经论述过了。在 1950 年代末期,美国为了缓和日本本土的反美情绪,把大部分美军基地迁移到了冲绳,将本土的非军事化和冲绳的要塞化作为表里一致的政策加以推行。借此,60 年代以后的日本本土牢固树立了亲美意识,对原子能的否定态度也减弱了。根据 USIS(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美国新闻处)在 1956 年实施的调查,还有 60% 的日本人觉得原子能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诅咒,但是到了 1958 年,这一比例急剧下降至 30% 左右(Kuznick,前述论文)。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人们渐渐淡忘了广岛、长崎以及第五福龙丸。

但是即便如此,在整个 60 年代,要求禁止核武器的潮流仍在继续,在 1968 年,还展开了激烈的反对核动力航母停靠佐世保港的斗争。而且进入 70 年代以后,冲绳回归近在眼前,部署在那里的美军基地的大量核武器势必引起关注。从美国方面来说,有必要设法进一步减弱日本人的“核过敏”这一认识并未有丝毫放松。从 1960 年代到 70 年代,美国积极向日本推销其原子能技术,这不仅让通用等企业获利,对美国的军事战略也是有益的。

正如从马克·盖恩(Mark Gayn)、道格拉斯·拉米斯(Douglas Lummis)到加藤典洋、武田彻等人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战后”这一时代是从我们“在原子能的阳光中晒太阳”开始的。但是如今战后时代终结,我们却“在辐射雨中撑着美国伞”走路。“原子能的阳光”是有光源的,那就是具有军用和民用两面性的美国核技术。核的阳光在整个冷战期间一直照耀着“战后”,但阳光终于变成了雨水,降到了我们的历史大地上。

福岛也好,柏崎^①也好,敦贺也好,位处偏僻的地域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需要持续的降雨。但是,现在已经经历了第四次严重核辐射的我们感到辐射雨中包含着比原子能阳光更危险的东西,为了躲避这种危险,再次撑起了美国伞。一方面,“原子能的阳光”使得电视、自有住房、大阪世博会、东京迪斯尼乐园等众多幻影出现。另一方面,为了躲避辐射雨而撑起的伞也是美国制造的,其内容也许是监视和认证技术以及危机管理体制,这些都是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的尖端技术。

本书在考察大阪世博会时,将首先思考对于从面临关闭的九州的煤矿移居到北海道的开垦地的家庭来说,“世博会”意味着什么。一边是连接九州的煤矿和北海道的开垦地的家庭的轨迹,一边是在大阪开幕的世博会,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在同样的落差中,福岛“滨通^②”的人们引进了美国的核电站,从煤矿的矿山摇身一变成为核电站的村庄。正如敦贺核电站的核反应堆所发的电支撑了大阪世博会那样,福岛核电站的核反应堆所发的电从 70 年代一直到泡沫经济为止,撑起了东京的消费文化。就这样,从世博会场的炫目光线到点亮消费都市东京的光线,“原子能之光”的洪水让三次遭受辐射的记忆成为了过去。

本书写的是从 1970 年大阪世博会到 2005 年爱知世博会的世博会史,并不会直接提及“原子能的阳光”和“美国伞”。但是,不管是在与地域的关系、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还是与“开发”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上,世博会在战后日本都呈现出了与同时代的核电站极其相似的面貌,这绝非偶然。以 1960 年代到 80 年代为全盛期的“世博会”和“核电站”的历史,勾勒出了何谓“战后日本”这一问题的存在基础。而且,在这种类比关系上,可以将 90 年代以后爱知世博会问题的发展与同一时期新潟县卷町^③的核电站问题的发展加以对比。这两个问题都显示出在整个战后史中都没有动摇过的体制开始引发地壳变动的征兆。核电站事故后的东北地区将会走上什

① 日本新潟县的一个市,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

② 日本福岛县的一个地区,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地。

③ 日本新潟县的一个町,1990 年代曾计划建一座核电站,但在 1996 年的居民投票中被否决,这件事对后来日本全国的反核电站运动和居民运动影响很大。